

铁冠道人张中生平事迹考略

谢忠志

一、前言

铁冠道人张中,在明史中并非是广为人知的人物,反而在武侠小说中,较能一瞻风采。金庸(查良镛,1924—2018)在著名武侠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,是以如此方式介绍铁冠道人的出场:

只听说不得道:“铁冠道兄,咱们找找韦兄去,我怕他出了甚么乱子。”铁冠道人道:“青翼蝠王机警聪明,武功卓绝,会有甚么乱子。”说不得道:“我总觉得有些不对。”忽听得一个声音从底下山谷中传了上来,叫着:“说不得臭和尚,铁冠老杂毛,快来帮个忙,糟糕之极了,糟糕之极了。”说不得和铁冠道人齐声惊道:“是周颠,他甚么事情糟糕?”说不得又道:“他好像受了伤,怎地说话中气如此弱?”不等铁冠道人答话,背了张无忌便往下跃去。铁冠道人跟在后面,忽道:“啊!周颠负着甚么人?是韦一笑!”……只听说不得沉着嗓子道:“小子,我跟你讲,我是‘布袋和尚说不得’,后面那人是铁冠道人张中,下面说话的是周颠。我们三个,再加上冷面先生冷谦,彭莹玉彭和尚,是明教的五散人。你知道明教吗?”张无忌道:“知道。原来大师也是明教中人。”说不得道:“我和冷谦不大爱杀人,铁冠道人、周颠、彭和尚他们,却是素来杀人不眨眼的。他们倘若知道你藏在我这乾坤一气袋中,随随便便地给你一下子,你就变成一团肉泥。”^①

经过六大门派围攻明教光门顶一役后,为保全主人翁张无忌安危,说不得和尚将其置入乾坤一气袋内。通过他人言谈,借以刻画人物形象,是文学常见的表达方式,因此金庸借由说不得之口,带出铁冠道人,并将其形容为“杀人不眨眼”的武功高强的人士。

前述引文,提及铁冠道人张中归属“五散人”,在明教里位阶甚高。明朝虽未有“五散

^① 金庸:《倚天屠龙记》第19回《祸起萧墙破金汤》,台湾远流出版社,2005,第735—736页。

人”等称谓的记述,但五个人物中,除布袋和尚说不得为杜撰之外,张中、冷谦、彭莹玉与周颠四人均是史实人物。不仅如此,金庸还巧妙地把韩山童(?—1351)、韩林儿(1340—1366)、朱元璋(1328—1398)与常遇春(1330—1369)等人,融入虚构的小说里,使得人物轶事难辨真假。

查察今人对元末时期至明王朝建立期间的研究,如明教、红巾军与元末群雄等议题均有专文剖析。张中、周颠等人虽曾为朱元璋麾下部属,但事迹并不彰显,甚少学者深入探悉。本文探讨的张中,因擅长太极数学,而被朱元璋网罗,由于成功预言陈友谅(1320—1363)败亡受到重用。但明朝立国后,张中却隐居钟山,尔后不知所踪。宋濂(1310—1381)对此啧啧称奇,遂撰写《张中传》,成为目前了解其生平最重要的张本。张中以道术名扬,而让史家、小说家有着力点加以渲染,不仅将其与周颠、刘基(1311—1375)同列,且加油添醋地载记其预言蓝玉(?—1393)叛变、朱棣(1360—1424)夺嫡等事件,张中因而被升格为神仙,甚至有《蒸饼歌》《铁冠数》等文传世,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因而,本文通过考察张中的生平,了解其事迹在明中期后不断累积的原因,以及分析其存在的时代意义。

二、张中名号、事迹与人际网络

张中,生卒年不详,仅知为江西临川人。史籍均不录其家世、著述等方面,仅说明其年少习儒,因未能如愿考取进士,遂纵情于山水,曾游历江右诸郡。后遇一异人,传授太极数学,从而改变一生。因元末避乱而归隐幕府山,却也常至城市与人讨论避兵良方。若从“从之者多获全”的记载来看,张中能教人趋吉避凶,显见道行已有一定能力。^①

元末时期,群雄竞逐,陈友谅、张士诚(1321—1367)、方国珍(1319—1374)等人势力强大,朱元璋在得到刘基、宋濂等人的襄助后,实力亦不容小觑。在刘基的建议下,拟定“先汉后周”的战略方针,决定先攻陈友谅势力,^②此一决定,也成为张中崛起的关键。至正二十二年(1362)正月,朱元璋势力进入江西,在邓愈(1337—1377)等人的协助下取得洪都(南昌),并统领江州、南康、建昌、抚州等地区,与陈友谅势力持续抗衡。朱元璋十分信任邓愈,任命其为江西行省参政,并以降将祝宗、康泰为其部从。^③朱元璋正值用人之际,张中为江右人士,邓愈因而举荐。

“预知”是术士的重要能力,意谓准确预言、减少变量与防患未然,将影响降至最低。虽有地域优势与宠臣背书,朱元璋面对“初出茅庐”的张中,仍颇有疑虑,以“赐坐”礼遇测试其

^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三,癸卯岁八月壬戌,台湾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1966,第735—736页。

^② [清]张廷玉等,郑天挺点校:《明史》卷一二八《刘基传》,中华书局,1997,第3778页。

^③ [清]张廷玉等,郑天挺点校:《明史》卷一二八《邓愈传》,第3749页。

能耐。由于朱元璋兵未血刃就取得南昌,十分担忧地方安定等问题,但张中仅答:“未也,旦夕此地当流血,庐舍焚毁殆尽,铁柱观亦化为灰烬,惟一殿岿然存耳。”^①不久,发生康泰叛变,果应验此说。张中也同时示警,朝中日后有人叛变,需加以提防,七月果然爆发平章邵荣(?—1362)、参政赵继祖反叛,两人相继伏诛,正如张中所料。^② 来年五月,朱元璋前往覆舟山(九华山)祭拜山川百神,也垂询张中此行状况,显见其逐渐受到朱元璋器重。

张中术数“占验奇中”,《明史》因而将其辑录于《方伎传》。^③ 然而,《明史·张中传》的内容,多摘抄自宋濂撰写的《张中传》,足见清朝官方正史认为此文有一定可靠性。宋濂《张中传》一文,共分三段,篇幅仅七百余字,前两段讲述张中从年少遭遇、初试啼声到崭露头角的经过,最后一段则是宋濂以主观角度,用以说明张中术数的奥妙、印证道术的真伪以及撰写传记的用意,摘录如下:

赞曰:濂数与中游,见其人类阳狂玩世者;与之语稍涉伦理,辄乱以他言,竟莫测其故。甲辰夏五月,同列二博士,有拂上意,方杜门待罪。中叩二人所生年,捉笔作点点,状如计数者。良久,笑曰:“不远,复期在七月五日。”濂书而识之。至六月之晦,有旨令二人复官。颇疑其术之未尽验,及获见上谢,则中所期也。中之术亦异哉!上尝亲疏十事,命濂作传藏金匱中。后六年,睹遗粟于故筐,因缮录之,而并纪所识之事^④

文中可知,宋濂与张中为旧识,为朱元璋侍臣,而宋濂在“甲辰年”与朱元璋共同见识张中术数的奇幻之处。甲辰年为元至正二十四年(1364),为朱元璋自立吴王后来年。至于宋濂提及撰写传记原因,系朱元璋所请,史事则取材于朱元璋“亲疏十事”及宋濂本身见闻。宋濂《张中传》因记载丰富、详细,为日后明人写史取材的重要蓝本。虽为当代人记当代事,但史源来自朱元璋及宋濂的所见所闻,并无其他相关史载,成为张中抄录生平事迹的底本。

综观明代典籍,对张中的记述有两部分值得深究:首先,在名号上,除少数误写为张忠或傅中外,^⑤其余一致书为“张中”。明人多对“字”有较大分歧,分成两类:一类主张字“景华”,以宋濂《张中传》为代表,《明史》《七修类稿》《孤树哀谈》《笔精》与《抚州府志》等书均

^① [明]宋濂:《荃坡前集》卷九《张中传》,《宋濂全集》第1册,浙江人民出版社,2014,第658页。

^②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一,壬寅岁七月丙辰,第3页。关于邵荣反叛的考察,可参阅李新峰:《邵荣事迹钩沉》,《北大史学》第8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1,第76—89页。

^③ [清]张廷玉等,郑天挺点校:《明史》卷二九九《方伎传》,第7633页。

^④ [明]宋濂:《荃坡前集》卷九《张中传》,《宋濂全集》第1册,第658—659页。

^⑤ 《秘阁元龟政要》误植“张忠”,但文后写正“张中”,至于《万姓统谱》写错成“傅中”。详见[明]佚名:《秘阁元龟政要》卷五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13册,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,1997,第367页;以及[明]凌迪知:《万姓统谱》卷九五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263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3,第382页。

是相同记载;另一派则确定字“景和”,以《太祖实录》为代表,《国朝典汇》《靳史》《皇明通纪法传全录》《今言》和《庚己编》等书均依此载录,且数量较记“景华”者多。追查二类抄录原本,无论是宋濂《张中传》或《实录》,均具有一定可信度,实难辨正孰为讹误,或如《明人传记数据索引》所列“张中字景华,一字景和”最为合宜。^①

在称号上,明代前后期称呼不一。张中因常戴铁冠,人称“铁冠子”,明初多从此称呼;或加上姓氏,故《明实录》等书多以“张铁冠”称,^②并未以“道人”称。明中叶以后,随着道教思想的弥漫,张中术数能力被广而宣之,因而在正德、嘉靖后的典籍,如都穆(1458—1525)在《都公谭纂》里,就改以“铁冠道人”称。^③ 尔后,甚至凌驾原本姓名,世人多知铁冠道人,而不知其名讳,^④这才有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“铁冠道人”。^⑤

其次,鄱阳湖之战的描述略有出入。鄱阳湖之役,是他最值得一书的成名之役,是张中的得意之作。因此,宋濂《张中传》一篇仅七百余字,却以二百多字描述他在朱元璋、陈友谅两军作战中扮演的角色,以及如何使用术数协助朱元璋打赢战斗的经过。简而言之,张中是朱元璋打赢鄱阳湖战役的关键之一。

根据宋濂之说,至正二十三年(1363)四月,陈友谅率大军围攻洪都城,洪都守军坚守近三个月,直至朱元璋驰兵襄助,并命张中随行。张中此行甚为重要,如船只无风不能前行,便设祭坛施法起风;常遇春孤舟深入反被敌军包围时,张中透过占卜要军士宽心勿忧,质言“亥时当出”,发挥安定军心作用。在朱元璋出兵之际,曾问张中状况,张中回答:“五十日当大胜,亥子之日获其首领。”从出发援助南昌,到陈友谅中流矢身亡而投降,共计五十日,再度让朱元璋见证张中的不凡之处。

然而,本段时间恐有谬误,可以钱谦益(1582—1664)的考察加以论证:

又《实录》纪辛卯之战,廖永忠等六舟深入。而《铁冠子传》则云:“己丑,战湖中之康郎山,常忠武王深入,虏舟数四围之,金以为不可救。”上曰:“勿忧也,亥时当自出。”如期果出,连战辄大胜。伪五王陈友仁及将士溺死者无算。辛卯、己丑,相去又三日。三文皆出宋学士手笔,不知何以与国史错互如此,更相考之。^⑥

^① 国家图书馆原编,王德毅增订:《明人传记数据索引》,台湾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、“中央图书馆”,1978,第157页。

^② 参见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三,癸卯岁八月壬戌,第170页。

^③ [明]都穆撰,[明]陆采编:《都公谭纂》卷上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266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,第647—468页。

^④ [明]李贽:《孤树哀谈》卷一《太祖上之上》:“今人类称之,而少知其姓名者。”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子部第240册,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,1995,第187页。

^⑤ 除宋代苏轼自号铁冠道人外,明代另有杨维禎(1296—1370)、詹仲和(1488—1505)均以此为名号。可参阅[明]徐(火勃):《笔精》卷七《铁冠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7,第267页。

^⑥ [清]钱谦益撰,张德信、韩志远点校:《国初群雄事略》卷四《汉陈友谅》,中华书局,1982,第101页。

查《太祖实录》记载：“辛卯，复联舟大战，俞通海、廖永忠、张兴祖、赵庸等以六舟深入，敌连大舰拒战，我师望六舟无所见，谓已陷没。”^①确为辛卯日，但宋濂却记“己丑日”，钱谦益不解竟有如此错误。

《太祖实录》为解缙(1369—1415)等人于永乐元年(1403)奉旨重修，晚出于宋濂一文，平心而论，宋濂之误尚可体谅，肇因于宋濂撰写《张中传》的目的，在于传播张中的奇人逸闻，以及凸显朱元璋的天命所归。《太祖实录》为明代最重要的官修编年体史书，除记述朱元璋的众望所归，更强调史事人、时、地的确切性，如宋濂文中声称，张中“五十日当大胜，亥、子之日获其首领”之说，《实录》则改为“(壬)戌、(癸)亥之日”，足见史官考史用心，并非只是传抄、誊录。^②

人际网络是本文值得深入探研的部分。张中玩世不恭，为人狷介寡合，正史虽未明言其交友状况，仍可根据相关典籍推敲。除宋濂之外，首推贝国器为挚友。《实录》《明史》等官方史籍并未载记贝国器生平，仅见《名山藏》《石匱书》与《罪惟录》等晚明野史中，查继佐(1601—1676)《罪惟录》则将贝国器的介绍，附于《张中传》后，足见两人事迹相类。上述这些典籍内容相仿，文中提及，贝国器为温州郭溪人，寓居海宁，以异术闻名，甚至可以缩骨藏于筒中。可从《名山藏》一书，窥见二人交友情况：

吴元年，与铁冠道人游白下，同宿，值高皇帝微行，假榻焉。因无枕，以斗为枕而寝。国器夜出视天，曰：“帝星临斗。”上遽昂首听之。铁冠曰：“尚离尺余也。”上大惊。明日召二人至，问国器以国号，对曰：“当是大明。”问铁冠以年号，对曰：“当是洪武。”皆上心所默定者益异焉。然恐其惑众，将杀之，俄而隐形，去不复见。^③

贝国器与张中同游共眠，可见交情匪浅。但本则掌故在字里行间，并无朱、张二人早已熟识的证据。张中协助朱元璋战胜陈友谅后不久，就隐遁不问世事，若与朱元璋偶遇南京，岂有不行礼之理？再者，从至正二十二年至吴元年(至正二十七年，1367)已五年余，仅因占验就亟欲除之而后快，君臣二人言谈丝毫不见热络，不太符合常理。最后，根据黄景昉(1596—1662)的考察，此轶事可能来自“汉武帝微行故事”而稍加修饰，^④显见本则史事恐

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二，癸卯岁七月辛卯，第160页。

②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三，癸卯岁八月壬戌，第170页；以及陈学霖：《明太祖“龙飞”官史“塑像”之分析——〈太祖实录〉史料探源举隅》，《明代人物与史料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2001，第51页。

③ [明]何乔远，张德信、商传、王熹点校：《名山藏》卷一〇三《方外记上·贝国器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0，第289页。

④ [明]黄景昉：《国史唯疑》卷一《洪武建文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432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第7—8页。但笔者查阅《汉武事略》《汉武故事》与《汉武洞冥记》等书，并未见得黄景昉指称的“原型故事”，笔者查阅不周详或此记录未能流传至今，实不得而知。

为后人加工而成，至于张、贝二人交往的实际状况也难定论。

亦可从文人集团思考张中的人际网络。不少明中叶成书的典籍，不约而同第记载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登钟山的事迹。当时，朱元璋兴致所到，不仅提笔赋诗，并要求随行官员如鲍尚綱、秦裕伯(1295—1373)、朱升(1299—1370)、张以宁(1301—1370)以及单友中等人应制，而张中也列名其中。^① 这些文臣中，秦、朱、张三人学养醇厚，秦裕伯更以诗文成名，能与这批文学之士一起应制赋诗，表明张中不仅通晓术数，文采亦颇受肯定，或能合理推测张中曾与上述文臣交往，甚至有一定情谊。

何孟春(1474—1536)的《余冬序录》，可能是最早考证此事的典籍。何梦春从唐文凤所作的《鲍尚綱行状》摘抄此轶事。^② 考察鲍、唐二人，明代典籍对鲍尚綱着墨不多，无法得知其生平；虽未有唐文凤传记，但通过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记载，唐文凤在永乐时期为江西兴国知县。^③ 再辅以《明史》参照，则发现值得玩味之处：如《秦裕伯传》：“洪武元年，……与张以宁等扈从，登钟山拥翠亭。”^④《张以宁传》《秦裕伯传》二文，虽书写登山的活动，却无张中之名，而《张中传》亦未记载此事，张中似乎不在出游名单之列。若考虑史籍付梓时间，《余冬序录》早出于《明史》，成书时间约在嘉靖六、七年间(1527—1578)，但清朝张廷玉(1672—1755)等人纂修正史时，却有所删节。《余冬序录》为明代典籍，李默(1494—1556)的《孤树哀谈》亦援引此轶事，因而本文采纳何孟春所记，认为张中曾与鲍尚綱、秦裕伯与朱升等人交游，并参与这场君臣间的文娱活动。

佛教中国化后，释道二教相互吸收、调和，观念较为志同道合。因此周颠、月庭和尚二人，也可能曾与张中往来。周颠为僧侣，与张中同为江西人，在鄱阳湖之役中，二人随侍朱元璋，与众人群策群力、通力合作，终能克敌制胜。^⑤ 至于月庭和尚，可从郑晓(1499—1566)的著作《澹泉笔述》略窥一斑：记载洪武元年时，月庭和尚精通天文，但与铁冠道人议论时不合，又出语犯上，被留置和州，后遭人怨谤而杖死。^⑥ 然而这些轶事，恐怕于史无据，却被野史搜罗其中。郑晓淹通群籍，留心国朝典章，^⑦却难免仍有未察处，遑论其余。

① [明]郑晓：《今言》之《三百一十九》，中华书局，1997，第179页。

② [明]何孟春：《余冬序录》内篇卷二五，台湾地区傅斯年图书馆藏据明刊本影印，第2b页。本则史料论及铁冠道人：“今人类称之，而少知其姓名者。”何孟春翻阅宋濂的《张中传》才知其姓名，也能印证前述明中期世人多不知张中轶事之说。

③ [清]永瑤等编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七〇《集部二十三·梧冈集八卷》：“文凤字子仪，号梦鹤，歙县人。与祖元、父桂芳俱以文学擅名。永乐中荐授兴国县知县，改赵府纪善，卒年八十有六。”商务印书馆，1933，第3621页。

④ [清]张廷玉等，郑天挺点校：《明史》卷二八五《秦裕伯传》，第7317页。

⑤ [明]郎瑛：《七修类稿》卷九《国事类·周张二仙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，第137页。

⑥ [明]郑晓：《澹泉笔述》卷七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17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，第232页。

⑦ [明]郑仲夔：《玉麈新谭》清言卷三《文学下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子部第38册，北京出版社，2000，第31页。

三、温故知新的“铁冠道人”

明代早期的内外朝野,对早先群雄割据、继承大统与建国取号等议题,多噤声不提。直到正德、嘉靖以后,中央控制力薄弱,法网渐疏,加上当时文士乐于记录、考究史事,使得私人记事着史的盛况空前。士庶喜谈人物轶事,也热衷拼凑历史的原貌,而道听途说且不加考证的叙事方法亦不在少数。张中因富有神通力,能增添人们的新闻话题与想象空间,成为坊间乐此不疲的讨论人物之一。

随着野史发达,史家试图补足宋濂的《张中传》未尽之处,其中以陆燾(1494—1551)《庚己编》最具代表。《庚己编》顾名思义,撰写于庚午至己卯十年间(正德五年至十四年,1510—1519),为陆燾年轻时未中进士前的力作,^①他是自宋濂后首位详述张中传记的文士。陆燾的《铁冠道人》与宋濂《张中传》大相径庭,内容多前代未曾听闻,或可谓全新的文学作品,成为日后的文史学家传抄的原本。

正德之后的文史学家,主要对张中从何而来、往哪里去以及预言事件等三部分较感兴趣,因而加以填补。本段将归纳所有讨论文本内容,整汇出三个不同于明初典籍记载之别:

(一) 相遇时间为至正十三至十四年

本部分叙述强调张中与朱元璋的相遇,以及张中使用相术辅助朱元璋的不凡之处。明代中后期的史家,认为张中早在至正十三年(1353),朱元璋“初驻滁阳”时,就通过武将引荐而相识。当时朱元璋仍为郭子兴(1302—1355)部将,于该年取得滁州,是朱元璋的第一个据点,因威名日着,而有张中求见,并极言:“明公龙瞳凤目,状貌非常,贵不可言。若神采焕发,如风扫阴霾,即受命之日也。”^②《皇明启运录》虽未有二人相识地点、相识原因,却记录二人相识时间为至正十四年(1354)十月。^③就是将时间提早八至九年,把地点从江西改为安徽,并省去举荐人邓愈之名。陈建(1497—1567)在《皇明启运录》里,更具体言明张中预言“受命应在千日内”。文中提及,张中受到朱元璋的重用,部分野史甚至指称,朱元璋决定都南京后,许多地址的勘查、规划多出于张中建议。

(二) 预言蓝玉案、靖难之役

洪武二十六年(1393),朱元璋以蓝玉谋反的罪名,趁机诛杀开国功臣,为明初四大案之一。即使今日都无法厘清蓝玉罪状,但当时街市热衷讨论这类禁忌话题。此时,文人则用二人相见的逸闻,隐喻蓝玉性格骄矜,不知大祸临头:

^① 李解民等人曾对《庚己编》书名、成书时间详加考察,可参考李解民:《从〈庚己编〉书名之批说起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5年第3期。

^② [明]陆燾:《庚己编》卷七《铁冠道人》,中华书局,1997,第75页。

^③ [明]陈建,钱茂伟点校:《皇明启运录》卷一,中华书局,2011,第14页。

梁国公蓝玉一日乘间访之,道人野服出迎,玉戏之曰:“脚穿芒屨迎人,足下无屨。”时玉以椰子瓢饮,道人荅云:“手执椰杯劝酒,尊前不钟。”盖密寓讥讽之意。玉武臣,勿悟,相与一笑而散。不久玉果被祸,而道人之言始验。^①

蓝玉案是当时的热门话题,多数典籍必定加以书写、讨论,如成书略早于《庚己编》的《客座新闻》,作者沈周(1427—1509)收录一则《术士胡日星祸验》,是则胡日星预测自己与蓝玉同日被杀的事件。此条虽经王世贞(1526—1590)考证,与蓝玉被诛的时间不符,但因此议题人物有讨论热度,同时具有警世作用,避免臣民僭越逾分,稳固朱明王朝统治。

至于当时明人最津津乐道的另一议题,则是“靖难之役”,也借由张中的事迹带动讨论风气。如徐学聚在《国朝典汇》提及,张中曾对洪武后期时局加以预言,其中几句说道:“戊寅闰五龙归海,壬午青蛇火里逃。”^②戊寅年是洪武三十一年(1398),为朱元璋驾崩之年,壬午年则为建文四年(1402),也是惠帝在位最后一年。词句巧妙呼应惠帝亡于宫中火起之说,文中却以“逃”字,表明事有蹊跷,生死似乎是未定之天,颇引人遐思。

亦有史家巧妙地将这段掌故填补于张中的生平事迹之中。如相传惠帝起兵时,曾有道士于路途喃喃自唱:“莫逐燕,逐燕日高飞,高飞上帝畿。”^③因而清康熙年间编纂的《江西通志》,就补入“建文时在金陵复见张中”的传闻,^④指称此名道士就是张中,更增添人们的想象,对张中的道术更加崇敬。

(三) 大中桥为投水地点

朱元璋对待功臣严酷,张中如何全身而退,颇令明人好奇。当时的掌故记录,也试图对张中生平作一结尾。因此,描述张中最后无故自大中桥投水而死,并未寻获遗体。日后潼关守官奏称,曾目睹某日铁冠道人策杖出关,时间恰为投水之日。^⑤至于文人选择“大中桥”作为张中的告别场域,颇富代表意义:大中桥是南京重要津桥,商贾、旅人往来频繁,恰可为历史事迹的见证人、传播者;另外,它是仙术的展示场所,如南都人熟知的“尹蓬头”,亦曾在此被人看出不凡之处。^⑥张中自我了断告别朱元璋,符合自身“仙道”风格,也让一生更添神秘色彩。

张中传记的流行,与当时流行私家著史、撰写人物传记有很大的关联。本文所谈的“私

^① [明]都穆:《都公谭纂》卷上,第647—648页。

^② [明]徐学聚:《国朝典汇》卷一三六《礼部·异术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6,第1707页。

^③ [明]邓士龙辑,许大龄、王天有主点校:《国朝典故》卷一四《奉天靖难记四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3,第276页。

^④ (康熙)《江西通志》于“按”表示,此歌谣未载于《明书》,故从《豫章书》所载。但今时已不复见郭子章(1543—1618)的《豫章书》,但在《国朝典故》中有相同记载。可参阅[清]谢旻:(康熙)《江西通志》卷一〇四《抚州府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516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3,第450页。

^⑤ [明]陆燾:《庚己编》卷七《铁冠道人》,第75页。

^⑥ 可参见[明]陆容:《客座赘语》卷八《尹山人》,中华书局,1997,第259—261页。

史”，是包含着重视考订史实的野史与重视记录叙事的稗乘、杂记，就是在《四库全书》分类中，被归属为“史部杂史”“子部杂家”“子部小说家”等类的书籍。明代中期，史书对张中较完整的描述，是在被王世贞（1526—1590）评为“好怪而多诞”的《庚己编》里，^①但也被搜罗在《靳史》《国朝典汇》等史书中，而这些方士、异术等议题，却是当时朝野乐于谈论的话题。

官史的缺漏，给民间史家提供了掌握诠释权的机会。靖难得位的成祖朱棣，并不修纂建文实录，造成明代史学发展的空窗，部分内容甚至与史实不符，因此“补阙”成为此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。^②不仅如此，清初出版的《铁冠图全书》，该书虽以“铁冠”为名，却以谐音暗喻人物，把铁冠道人改名为“张冲”，字也更为“子华”。该书以铁冠道人为朱元璋作图占卜国祚为楔子，主要叙述闯王李自成（1606—1645）的崛起与殒落，终则明亡清兴，使得铁冠道人的占验成真。^③《铁冠图全书》不以张中为主角，但却借由张中的预言、占验，形塑张中预知生死、洞悉古今的仙人形象，因而不少明人将其与周颠、张三丰同归于仙道一门；^④其料事如神的预言能力，经由小说家渲染后，具仙风道骨，更显得高深莫测，在民间逐渐受到瞩目，甚至可与刘基同列，成为另一位明代“神机妙算”的代表人物。

四、结 论

金庸小说中，铁冠道人人物鲜明程度，实逊于同列“五散人”的说不得、冷谦等人，但在元末明初，却是一位确切存在的历史人物。张中因进士不第，纵情于山水，巧遇异人传授术数，自此改变一生，拜入朱元璋帐下，成为协助击败陈友谅的重要谋士，走向人生的巅峰，但不久后便辞官隐世，不知所踪。宋濂身为张中友人，提笔撰写《张中传》，将其事迹流传后世。

尽管有宋濂的《张中传》《太祖实录》与《明史·张中传》等官方史书记载张中事迹，但内容不尽相同，如在名字上有景华、景和之别，别号则有铁冠子、铁冠道人之差，说法莫衷一是。而在鄱阳湖之役中，宋濂《张中传》所记述的时间与史实不符，《太祖实录》及文人钱谦益均加以考究其讹误。然而，宋濂著述的目的着重记事，记录“占验奇中”的异人张中，叙述曾经协助朱元璋的谋臣张中，考证史实并非要务。

迄至正德以后，政治控制力薄弱，文士留心于著述，关怀奇人轶闻，因而张中的事迹再被搬上台面。文史学者试图重建张中人生，在生平上，将朱元璋、张中相遇时间，从至正二

十四年提早到至正十三、十四年间，并将“大中桥投水”作为人生谢幕，充满传奇色彩。此外，为强化预知能力，将蓝玉案、靖难之役适时地点缀到人生事迹之中，强化人物形象。清初的《铁冠图全书》更是将张中形象推至高峰，张中骤变为洞烛先机的高人。大体来说，在明人笔下塑造的张中形象，是朝着方士、谋臣、仙人的身份逐渐转变的。

明朝的历代典籍，试图塑造一个“通天文、晓历数”的铁冠道人。但本文借由《余冬序录》的记载，看到一则曾经被忽视的历史事实：一个与明太祖及其词臣同登钟山应制赋诗的张中，一个原本习儒应举，因落第而投身术数的张中，却在君臣同欢的文娱活动中，展现不同于方士身份的风采。

通过众多野史对张中生平的记述，此一书写历程，可看到明太祖对术士的仰赖，也可窥见明中期知识分子汲汲于书写历史、传播新闻的向往。尽管为数不少的典籍，内容记载多为荒诞不经的奇闻轶事，却也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我们能借此了解正德以后道家思想的流行，以及史学蓬勃发展的现况。从明代中后期史家对张中的书写和传抄，竭力拼凑残缺不全的张中传记，可获知当时士民对求取新知的渴望。铁冠道人张中在明代前后期书内容变动颇大，可能肇因好事者的狗尾续貂，也可能是史料、事证的新发现，使得张中在隐遁后的空白得以完整，接续未完的传奇人生。

（谢忠志，台湾文藻外语大学通识教育中心）

① [明]王世贞：《弇山堂别集》卷二〇《史乘考误一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，第361页。

② 关于明中后期建文史籍的编撰，可参见杨艳秋：《明代史学探研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5，第216—232页。

③ [清]松滋山人：《铁冠图全传》，春风文艺出版社，1998，第581—583页。

④ 可参考[明]王鏊：《震泽长语》卷下《仙释》：“若神仙者，谓之有，则平生未之见；谓之无，则古今所传奇踪异迹不可胜纪。国初周颠仙、张铁冠、张三丰，灼灼在人耳目。”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4编第5册，台湾新兴书局，1978，第27a页。